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变迁（1990—2022）

朱 斌 卫天乐

摘 要 使用 1990—2022 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包括扩展版）来源期刊的数据，借助新概念、新理论与理论体系三个维度，可探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的趋势与现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引入新概念、新理论的行为逐渐减少，一个逐渐扩大的概念内核在学科概念网络中逐渐形成，且越来越多学者同这一概念内核进行对话。这一过程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从借鉴西方概念与理论的“软革命”时期，逐渐建立起自身的核心概念、核心结论与典型化事实，进而形成稳定知识体系。这些宏观指标的变迁可以通过内生结构因素、外生社会影响与个体行为因素加以解释，其中个体行为的解释力最明显，学者对成功学者的效仿与对大多数学者行动的模仿能够有效解释体系化进程的整体趋势。

关键词 知识体系变迁 概念网络 机制解释

作者朱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卫天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6)02-0195-15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被写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等重要文件，成为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遵循。^①当前学界围绕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产生了大量学理探讨，但缺乏深入系统的实证研究。更重要的是，现有知识变迁的理论机制大多都是基于西方的知识体系演化提出的，学界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变迁模式缺乏相应的关注。^②科学的实证研究不仅能够直观呈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实际变迁过程，还能够通过对变迁机制的检验回应基于西方经验而形成

①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联合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学科大类，综合考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设立的学科评审组，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包含以下学科大类（括号注明了与之对应的学科评审组名称）：哲学（包含：哲学、宗教学）、经济学（包含：理论经济、应用经济、统计学）、法学（包含：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研究、马列·科社、党史·党建）、教育学（包含：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文学（包含：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历史学（包含：考古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管理学（包含：管理学、图书情报与文献学）。但需要注意，不仅现行文件中没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致定义，学科分划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② Nitsan Chorev, Amanda C. Ball,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the Global Sout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8(1), 2022.

的知识变迁理论，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变迁提供洞见。

为了完整描述知识体系的宏观模式变迁，我们将知识体系划分为概念、理论与理论体系三个依次递进的维度。首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概念的出现^①；其次，这些概念必须同现有的学术概念产生联系才能真正被融入到学科的知识体系当中，而现有概念的新组合也能够构成理论创新^②，因此本文将概念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称为“新理论的形成”^③；最后，若干理论相互交织，形成了学科特有的理论共识与关注焦点，也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

综上，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从概念、理论、理论体系三个方面来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其变迁机制又是怎样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获取了从 1990 年到 2022 年间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包括扩展版）来源期刊（下简称 CSSCI）的所有论文，使用网络分析与文本分析的方式构建了知识体系的相关指标，从而呈现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演变过程，并建立“微观—宏观”双层差分模型探讨了不同机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宏观知识变迁。

一、知识变迁过程及其机制探讨

目前对知识变迁的过程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连续变迁图式将科学描述为知识的稳定积累，革命图式强调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认识断裂，循环图式则认为知识变迁不断处于某种周期性循环。为了解释知识变迁的动力，内部主义强调内生结构因素的影响，外部主义则强调外生社会与个体行为两种因素。

（一）知识变迁图式

尽管知识变迁的图式受到时间尺度、社会情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学界依然认为这些变迁图式可以归为若干基本图式的组合。其中，连续变迁图式可能是理论家最早的设想，该图式将知识变迁描绘为一个知识逐渐积累的过程。一个典型案例是培根通过发现表与归纳法描述科学进步的模式，其中经验现象可以归纳出低级法则，这些低级法则又层级式地归纳，最终到达形而上学。^④由于“归纳原理”的正确性难以论证，科学哲学在解释科学发展时通常采用“准归纳”的视角。例如，波普尔要求科学获取具有更高可证伪度的猜想，并在尚未被严格检验证伪时接受这一理论。^⑤

然而，库恩把这种连续的增长视作一种“只存在于教科书中的幻觉”^⑥，并提出了科学革命图式。库恩首先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也即科学家公认的知识框架，这一框架可以很好地解释科学家们关注的范例。而基于“范式”的稳定性可以将科学分为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两种时期：常规科学时期“范式”保持稳定，科学家们在范式的基础上，以更精确的方式证明范式或消除范式中模糊的地方；科学革命则在与范式不兼容的“反常”得以扩大的时候出现，而科学家需要转入能够解释这一反常的新范式来继续科学工作。^⑦

学界目前依然在争论哲学社会科学是否适用于前述两种图式。例如波普尔就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依然要“提出可被经验反驳的假说”来实现增长。^⑧库恩则指出社会科学尚且处于“前范式”的阶段，缺乏进入现代科学的“革命”。^⑨但无论如何，这两种图式都以科学的进步为根本前提，哲学社会科学未必适用。例如阿伯特认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而是不断地处于循环的状态当中。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流派都可以划分为一系列基本要素的重组，例如“实证—诠释”和“定性—定量”。^⑩而一旦学界产生了某种普遍偏向，批判与反思就会形成一种相反的作用。在这两种作用下，哲学社会科学整体上并没有

① 孙正聿：《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② Brian Uzzi, et al., "Atypical Combinations and Scientific Impact," *Science*, 342(6157), 2013.

③ 这里使用“理论”一词可能收窄了“理论”的具体意涵。理论不仅包括新颖组合，可能还包括叙事、抽象性陈述等情形，但不可否认的是新颖组合构成了目前社会科学理论中一种关键的形式。

④ 培根：《新工具》，许宝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8—114页。

⑤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54—70页。

⑥⑦⑧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119、44—65、12页。

⑧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Glyn Adey, David Frisby (eds.),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 Ltd, 1976.

⑩ Andrew Abbott, *Chaos of Discipli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10—15, p. 28.

真正的发展，而是不断地“代际循环”。^①

尽管阿伯特为循环图式给出了若干经验证据，哲学社会科学的停滞状态依旧是一个存疑的假定。为此，循环图式更多地被描述为科学中周期性增长的状态，例如，研究者利用吸烟的案例表明科学共识的“螺旋式”形成^②；李钧鹏与周港识别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大致符合柯林斯提出的“扇形伸缩”模式^③。这些研究也表明科学知识发展更多是上述三种图式的结合：科学知识确实在连续不断地发展，但并非线性的连续积累，而是存在特定的周期性循环。

此外，文献学与科学学也不断使用数学与计算机建模对科学知识增长展开更加精细的描述，这一尝试最早起源于普莱斯的文献计量研究^④，并在随后发展出越来越多的形式与机制，例如在引用网络与共同作者网络中存在的“先行者优势”或“多元化”机制^⑤。这些机制极大地增加了知识变迁模式的复杂性、多元性与情境性。然而，这些研究通常从过于理想的单一假设出发来构建数学推演，有时甚至忽略机制要素而简单地使用计算机拟合来描述现象。因此，为了增强对变迁图式的解释力，本文希望在描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变迁的同时，探究多元机制在形塑特定知识变迁图式中的作用，这些具体机制将在下一部分得到叙述。

（二）知识变迁机制

现今学界倾向于从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两个视角来理解知识变迁的原因。^⑥其中，内部主义利用学科内生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潮流来解释知识变迁，而外部主义则强调外生社会与个体互动起到的重要作用。基于这两种解释视角，本文将影响知识体系的因素划分为结构因素、行为因素与社会因素。

内部主义认为知识变迁遵循其内在逻辑，这种逻辑主要包括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惯例。随着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科学知识不再被视为客观法则，而是基于约定的符号、模型与范例所形成的共同的认识论框架。^⑦进入学科共同体的学者通过学术社会化与学科训练来习得这一认识论框架，并在思考时服从于相应的认识论惯例。^⑧在此基础上，科学实践就是延续方法论惯例开展日常行动。认识论惯例与方法论惯例一旦形成后就会成为结构性因素，对知识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这些影响包括：知识不能凭空产生，理论只有在现有概念中才能得以建立；只有与现有结构保持一致的命题才能够得到普遍接受^⑨；只有得到充分讨论的概念和理论才能构成不断延展的学科认识论中的一部分。

外部主义认为社会因素影响知识体系变迁，包括学科共同体内部的社会互动以及学科共同体以外的社会因素。^⑩就学科共同体内部的社会互动而言，“模仿（imitation）”和“效仿（emulation）”是两个重要的机制。^⑪本文所讨论的“模仿”，是指学者会采取和大多数学者相同的行为，这一机制依托于学者在共同认识论环境中通过学术训练习得的学科知识与学术惯习。^⑫而“效仿”则是指学者会采取和成功学者相同的行为。这一行动在学术界十分普遍，例如，有学者会效仿以论文发表取代专著编写来完成考核的方式，以求快速晋升^⑬；或者为获得学术声望而效仿从学术研究转向行政管理的生命历程^⑭。需要注意，在模仿与效仿之外，学

① Andrew Abbott, *Chaos of Disciplines*, pp. 23-27.

② Uri Shwed, Peter S. Bearman,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Consensus Form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6), 2010.

③ 李钧鹏、周港：《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与遗忘（1980—2022）》，《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1期。

④ Derek De Solla Price, "Networks of Scientific Papers: The Pattern of Bibliographic References Indicates the Nature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Front," *Science*, 149(3683), 1965.

⑤ Mark Newman, "The First-mover Advantage in Scientific Publication," *Europhysics Letters*, 86(6), 2009; Walter Powell, et al., "Network Dynamics and Field Evolution: The Growth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Life Sci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4), 2005.

⑥ 李钧鹏、许松影：《必要的张力：社会学思想史的内外之分》，《学术月刊》2023年第9期。

⑦ Thomas Kuhn, *The Essential Ten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294-302.

⑧⑫ Barry Barne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Abingdon: Routledge, 2009, pp. 64-69.

⑨ Mengjie Cheng et al., "How New Ideas Diffuse in 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8(3), 2023.

⑩ 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项比较研究》，刘晓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1-17页。

⑪ Christopher Bail, et al., "Prestige, Proximity, and Prejudice: How Google Search Terms Diffuse Across the Worl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5(5), 2019.

⑬ 黄宗智、赵珊：《专著：中美社科学术体系的比较与展望》，《东南学术》2024年第1期。

⑭ 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65-707页。

者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行为机制。

另一方面，外部主义也会援引政治、经济、社会等外生因素来解释学术变迁。首先，这些外生社会因素会影响研究问题的选择。例如，由于中国学者所具有的实践特性与家国情怀，中国的学术产出格外重视国家与社会的突出问题。^①其次，这些外生社会因素也会成为科学评价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对科学研究的评价早已不再局限于引用次数、下载数量，其背后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也成为衡量研究价值的重要指标。^②最后，在一些情况下，经济利益与政治立场也会直接导致有偏倚的结论产出，成为学术不端的诱导性因素。^③

（三）文献评述

尽管现有文献广泛探究了知识变迁在不同学科与社会情境下呈现出的模式，这些讨论依然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其一，知识变迁理论大多依据欧洲与美国的学科史来建立，这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知识变迁的适用程度是存疑的。^④尽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已经出现大量对自身学科知识体系建设过程的讨论^⑤，但从单一学科出发，难以整体归纳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遵循什么样的路径。

其二，从经验上来看，目前依然缺乏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究竟进行到了何种程度的实证分析。本文将重点关注知识体系构建中的新概念、新理论与理论体系三大面向。相比于其他指标，学者生产的文本更能够直接反映知识体系的建设现状，而 CSSCI 论文又构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因此，本文希望利用 CSSCI 论文的文本数据，分别构建指标对其中新概念、新理论与理论体系的变化情况进行测量，进而明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二、研究假设

本文借鉴现有研究，使用关键词在学术论文中的共现来生成学科的概念网络。^⑥依据概念网络中节点与边的类型可以测量学者的学术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面首先分析新概念、新理论与理论体系三大要素可能的变化路径，这些路径共同描述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变化，随后阐明这种知识体系变化的形成机制。

（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变迁图式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迁是一个不断探究自主化的过程。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早期，西方思想不断进入中国^⑦，这些多元的思潮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并不断同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理论体系与分析方法。改革开放后，不仅西方各种新的理论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中国社会本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需要进行新的理论整合，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深入分析。同时，中国学界对于自身知识体系建设与学科范式构建的理解不断深化，提出了诸如“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发 展进路纲要。^⑧而自身知识体系的建设也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后全面加速。

上述论证表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并不像连续变迁图式所设想的那样是平稳发展的，也不是库恩意义下，由于“反常”扩大而形成的整体的认识论断裂与范式更迭。这种情形更接近于原本发展的学术脉络受到了内生或外生的冲击，因此需要在不断探索当中整合出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本文将这一现象称为“软革命”，不

① 彭圣钦、周晓虹：《社会学本土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绵延不断的学术追寻（1930—2022）》，《开放时代》2023 年第 3 期。

② Michael Gibbons 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London: SAGE, 1994, pp. 31–34.

③ 雷斯尼克：《真理的代价：金钱如何影响科学规范》，蔡仲、韦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31 页。

④ Nitsan Chorev, Amanda C. Ball,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the Global Sout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8(1), 2022.

⑤ 参见陈华珊、叶锦涛：《知识图谱及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科学范式变迁：以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为例》，《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吉瑞新、范晓光、欧海洋：《殊途异类：中国和美国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及其演变（1991—2023）》，《智能社会研究》2025 年第 4 期。

⑥ Jacob Foster, et al.,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Scientists’ Research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5), 2015.

⑦ Hon Fai Chen, *Chinese Sociology: State-building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lobally Circulated Knowledge*, New York: Springer, 2017, pp. 11–12, pp. 54–55.

⑧ 陈云松：《“社会学想象力”的重思与拓展》，《中国社会科学》2025 年第 1 期。

同于传统科学革命所说的知识体系的“断裂”，这种软革命以对理论重组与知识体系的积累生成为核心。^① 在中国语境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综合多种理论话语，结合中国社会事实的逐步范式构建过程。^② 社会现实所引发的这种从“软革命”到“自主范式性构建”的过程引发了本文的基本假设：

假设 0：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改革开放后呈现革命性图式与连续变迁图式的结合，也即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了“软革命”，随后以连续变迁的模式逐步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与理论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学科在研究与商讨中逐渐形成学科共识，并进一步转化为学科范式。依据现有研究，这可能包含三大过程。^③ 其一，各个学科按照自身学科传统与认识论惯例，不断探索在新社会秩序下旧有学科议题以及不同理论的适用性。其二，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各个学科逐步确定了在中国实践中所获得的核心经验结论，这些结论也被称作“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其三，为了持续观测这些典型化事实的形态与变化，学科逐步建立起配套的诸如社会调查、核算数据、核心文献等知识基础设施。围绕这些知识要素，学科可能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包括研究方法的细化、对特定事实的持续追踪等。这三方面的变化会对新概念、新理论与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不同形式的影响。

首先，知识体系的确立会使得各个学科的学术语言变动逐步减少，学者也不会热衷发明新概念，而会转用成熟的、现成的学科概念来描述现象，叙述结论。其次，典型化事实的确立与知识基础设施的固定会阻碍新理论的产生，相较于在概念之间建立全新的联系，学者将更偏好更新研究方法与数据，并提高现有理论的适用范畴。最后，上述过程会进一步导致理论体系内核的扩大，这些内核会成为各个学科的认识论共识，学者需要与之进行对话，从而使其学术产出能够发表并获得学科共同体的认可。这些变化构成了下述假设 1a, 1b 与 1c：

假设 1a：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使用逐渐趋于稳定，也即学者越来越少地使用新概念。

假设 1b：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理论不断减少，也即学者会更少通过在概念之间建立新联系来提出新的理论。

假设 1c：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内核”愈发扩大，学者在开展研究时也会更多地同现有的内核进行对话。

（二）影响变迁图式的可能机制

如前所述，知识变迁的影响机制包括内生结构因素、个体行为因素与外生社会因素，那么这些因素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变迁呢？

首先，从微观层面看，学者的模仿行为与效仿行为某种程度可以解释上述知识体系的变化。模仿机制认为，受到学科认识论框架与身份认同的影响，学者倾向于遵循其他学者普遍采用的研究方式，偏移主流的行动模式也会受到学科共同体的系统排斥，这进一步强化了模仿的动机。相比之下，效仿机制则认为学者更可能选择被证明“有效”的学术行为，这里“有效”意味着受到学界更多的引用与认可。学者效仿的动机一方面来源于对成功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来源于韦伯称之为“赌博”的不确定性与晋升压力。^④ 可以合理推测，如果某位学者在学术回报（如引用、认可度等）上与成功学者的差距越大，那么其向成功学者学习、调整研究策略的动力也会越强，本文称之为“回报差异驱动机制”。根据上文知识体系构建的三个维度，学者的研究策略包括是否引入新概念、是否在概念之间建立新联系（即是否提出新理论）、以及是否同理论体系内核进行对话。那么上述机制可以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 2a（中心趋向作用机制）：从微观动态来看，学者会模仿其他多数学者的主流研究策略。

假设 2b（最优趋向作用机制）：从微观动态来看，学者会效仿那些成功学者的研究策略。

假设 2c（回报差距驱动机制）：从微观动态来看，学者的研究策略调整受到其当前学术回报水平与成功学

① 冯仕政：《范式革命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社会》2022年第6期。

② 张东刚：《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③ Daniel Hirschman, “Rediscovering the 1%: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Stylized Facts of Ineq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7 (3), 2021.

④ 马克思·韦伯：《以学术为业 以政治为业》，《马克思·韦伯全集》第17卷，吕叔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9页。

者之间的差距的正向影响，差距越大，学者的研究策略调整幅度越大。

其次，从宏观层面来看，学科概念网络也会影响学者的行动，这种影响可以归为“结构变化作用”与“要素变化作用”两类。“结构变化作用”指学科概念网络结构对于学者行动的影响，例如：更加“密集”的概念网络会压缩学者创造新概念、新理论的意愿。在操作化部分，研究分别引入了概念可塑性、理论可塑性与内核规模三个指标来测量学科概念网络的整体样态，并判断这些指标是否对新概念、新理论与理论体系的演化产生约束。为此，研究提出假设 3a：

假设 3a（结构变化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科概念网络所呈现出的整体宏观环境指标愈发不利于新概念的出现、新理论的生成，这些环境也愈发偏好体系化的学科知识结构。

“要素变化作用”则指其他要素变动对于学者行动的影响，例如新概念减少了，新理论自然更难形成。事实上，“概念—理论—理论体系”并非三个平行的要素，而是存在递进关系。从概念引入来说，如果一个学科中新概念的出现逐渐减少，可供建立理论的空间就越少，理论体系也会趋于固化。从理论要素来说，当一个学科内部的概念保持相对稳定的时候，随着新理论的不断提出，学科内部既有概念之间的联系被不断发现，进而逐渐形成稳定的知识结构，这种过程可以理解为理论体系的深化。为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3b 与 3c：

假设 3b（新概念的要害变化作用）：新概念的减少最终会导致新理论的减少，并促进知识的体系化过程。

假设 3c（新理论的要害变化作用）：在概念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新理论出现的增多会促进知识体系的形成。

最后，外生社会因素同样会对知识体系的形成造成影响。^①许多研究都显示，知识生产容易受到国家注意力的影响，在中国尤其如此，国家关注的议题通常会转化为知识体系中的新概念，并作为描述中国社会的标识性概念而得到推广。因此，如果特定学科在特定发展阶段受到外生影响更大，这些影响能够有效转化为该学科的标识性概念，进而产生更多的新概念。知识体系中的概念整合过程通常由学科共同体内部控制，外生因素只能间接影响这一整合的过程动态。然而，中国学者所特有的实践性特质则要求将外生的概念整合到既有理论体系内容当中。这种冲突的力量表明，外生社会因素对理论与理论体系的影响可能并不在于动态机制，而是聚焦于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

假设 4a：如果学科受到外生社会影响更大，该学科会更多地建立新概念。

假设 4b：外生社会影响不会对新理论与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产生显著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可能体现在理论体系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当中。

三、数据与指标构建

（一）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为探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本文基于 CSSCI 论文数据构建指标展开分析。研究数据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平台公开呈现的信息，通过程序化方式对论文进行批量采集与结构化整理。具体而言，采集的信息包括论文篇名、作者、发表时间、期刊来源、摘要以及作者提供的关键词等内容。在学科选取方面，本文以 CSSCI 自带的分类体系作为基准，选取了考古学、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新闻学、法学、语言学、管理学、文献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共计 16 个学科^②，涵盖论文总计 2377310 篇。在剔除研讨会、会议综述、书评等非学术论文后，将各个学科中出现频次超过一定基数的关键词视为该领域研究的核心概念^③，并据此构建各学科的概念网络，这也是当前文献的主要研究路径^④。各个学科的核心概念数如表 1 所示。具体而言，在构建概念网络时，本文将摘要与关键词中所有与选定核心概念相匹配的词语筛出，这些核心概念构成网络的节点，如果两个概念曾共同出现，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一个

① Helga Nowotny, et al., “‘Mode 2’ Revisited: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Minerva*, 41(3), 2003.

② 由于包含很多非学术类型的文献，本文剔除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关的文献；考虑到文献基数问题，本文剔除了冷门绝学领域的文献；由于包含不同学科的文献，本文剔除了高校学报与综合社会科学类别的期刊。

③ 这样处理可以避免某一学科的关键词过多，从而影响数据处理效率并歪曲研究结果。通过尝试不同的基数，我们最终选定该学科论文总数除以 20000 作为这一基数，这样在保持规模的条件下获得的议题最为精准。

④ 然而，如果使用全文本的共现可能会高估一些连边的占比。为此，研究也进行了句级共现的测量，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事实表明，这对结果并没有本质的影响。

边,也是当前学界的通用做法。^① 本文的分析时间跨度为 1990 年到 2022 年,并将学科 d 在第 t 年中核心概念的出现频率记为 $F_{d,t}$,对应的概念网络记为 $G_{d,t}$ 。

表 1 不同学科的核心概念数

学科	核心概念数	学科	核心概念数
考古学	9438	语言学	10831
经济学	12214	管理学	11388
教育学	11178	文献学	8938
民族学	12316	哲学	15042
地理学	12738	政治学	12307
历史学	12312	心理学	12574
新闻学	10225	宗教学	11780
法学	13304	社会学	13277

在时间演化上,本文采用累积式网络构建策略:1980—1989 年间首次出现的概念及其共现关系构成初始概念网络;此后,每一一年中新出现的节点及其与既有节点之间形成的连边被依次添加至上一年网络中,从而形成当年的概念网络。考虑到研究时间跨度相对有限,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整体呈现出明显的知识积累特征,本文暂不引入概念遗忘或连边衰减机制。图 1 展示了本文整体的数据分析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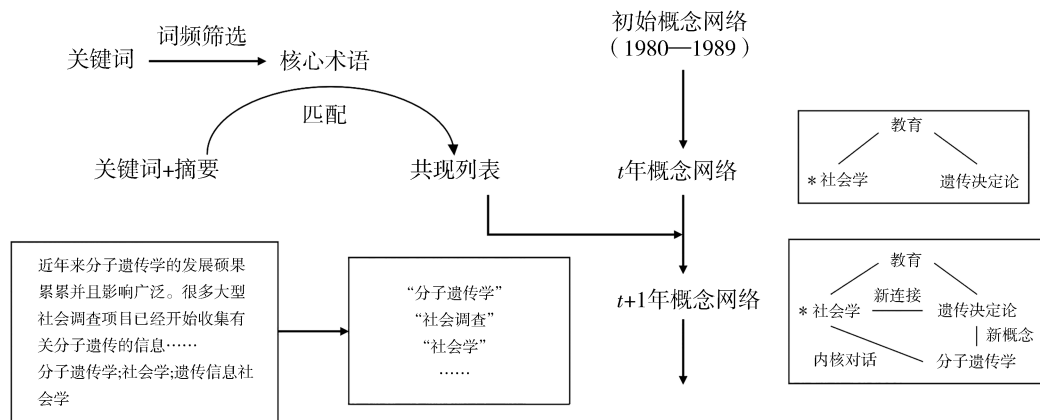


图 1 本文的数据处理与学科概念网络构建过程^②

(二) 新概念、新理论与理论体系的指标构建

基于上述动态网络,本文进一步对当年新增的连边进行类型划分。具体而言,假设在年份 t 中新增一条连接概念 i 与 j 的连边,则其判定规则如下:第一,若概念 i 或 j 在 t 年以前从未出现过(不属于 $G_{d,t-1}$ 的节点集合),则为“新概念”;第二,若概念 i 和 j 在 t 年以前均已存在,但尚未形成连边,则为“新连接”;第三,若 i 与 j 两个概念至少有一个在 $t-1$ 年的概念网络中被识别为核心节点,则该连边为“内核对话连边”,表明与现有的理论核心展开了对话。^③ 其中,本文采用 Kcore 分解算法识别理论核心。这一算法能够识别网络中连接密度较高的节点。^④

为了避免指标受到当年所有概念联系的绝对数值的影响,研究更加关注新概念、新连接与内核连接在当年所有连边中所占的比例。更具体地来讲,假设 t 年间生产的学术论文包含了 N 个概念网络中的连边,其中 $n_{concept}$ 个连边含有未曾出现的新概念, n_{link} 个连边属于“新连接”, n_{core} 个连边展开了“内核对话”,那么新概念比例、新连接比例与内核对话比例可以分别按照与 N 的比值来计算,如表 2 所示。

①③ Jacob Foster, et al.,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Scientists’ Research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5), 2015.

② 在概念网络部分,此处仅筛选了一个子图作为示例,其中: * 标注了内核概念。此外,连边属性不唯一,与分子遗传学相连的都是新概念连边;与社会学相连的都是内核对话。

④ 参见 Yi-Xiu Kong, et al., “K-core: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Physics Reports*, 832, 2019。

表 2 变量描述表

测量对象	变量名称	计算方式	变量解释
新概念	新概念比例	$\frac{n_{concept}}{N}$	学者引入新概念的连边占当年所有行为连边的比例，值越高意味着学者越多地在论文中使用新概念
新理论	新连接比例	$\frac{n_{link}}{N}$	学者建立的新连边占当前所有行为连边的比例，值越高意味着学者越多地在论文中引入新理论
理论体系	内核对话比例	$\frac{n_{core}}{N}$	学者与内核节点形成的连边占当前所有行为连边的比例，值越高意味着学者越倾向于与学科核心概念形成对话

(三) 模型

考虑到行为因素主要描述微观层面机制，而内生结构因素与外生社会因素都在宏观层次产生影响，本文使用“微观—宏观”双层模型来捕获这些因素对知识体系构建的影响。图 2 展示了模型的整体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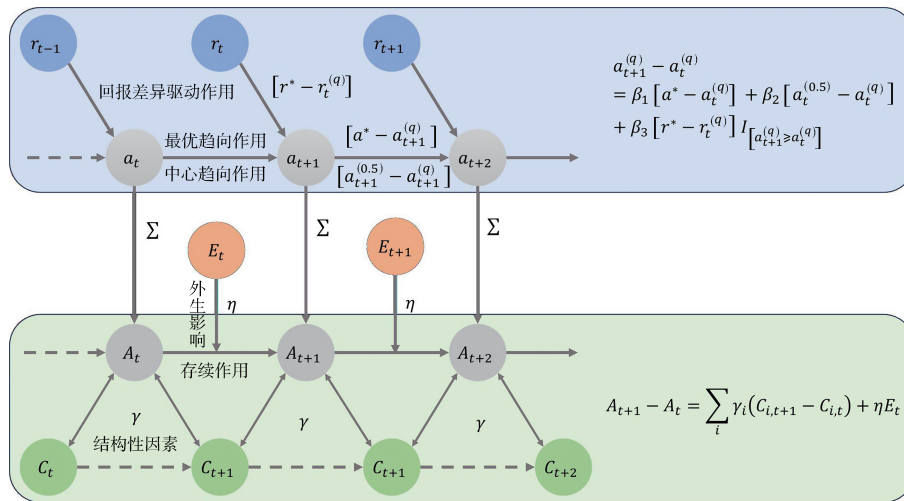


图 2 知识变迁双层模型的模型结构

首先聚焦于微观部分，即图 2 上半部分。我们将学者引入新概念、建立新理论、与理论体系对话三种行为的占比记为 $a_{i,t}$ ($i=1,2,\dots,N_t, t=1990,\dots,2022$)，每篇论文受到的奖励（包括引用与影响因子两种形式）记为 $r_{i,t}$ ($i=1,2,\dots,N_t, t=1990,\dots,2022$)。由于并非每位学者在每年都会发表，我们在文献行为占比的分布中选取了 100 个分位数，以模拟具有相似行为模式学者所做出的行动 [记为 $a_t^{(q)}$ ，其中 $q=0,0.01,0.02,\dots,0.99$]，并通过 Lowess 函数拟合获得这些学者获得的奖励^①，基于上述记号，研究的微观模型具有如下形式，其中 a^* 为最高引用对应的学者行为， r^* 为最高的奖励（引用数或期刊影响因子）：

$$a_{t+1}^{(q)} - a_t^{(q)} = \beta_1 [a_t^{(0.5)} - a_t^{(q)}] + \beta_2 [a^* - a_t^{(q)}] + \beta_3 [r^* - r_t^{(q)}] I_{[a_{t+1}^{(q)} \geq a_t^{(q)}]}$$

简单来说，模型的因变量是学者两年间，引入新概念、建立新理论、与理论体系对话三种行为的占比变动。自变量有三个：一是与前一时期中位数学者行为之间的差异 $[a_t^{(0.5)} - a_t^{(q)}]$ ，二是与前一时期获得最多奖励的学者之间的行为差异 $[a^* - a_t^{(q)}]$ ，三是所获得的奖励与前一时期最高奖励之间的差异 $[r^* - r_t^{(q)}]$ 。^② 这分别对应中心趋向作用、最优趋向作用与回报差异驱动作用。如果 $\beta_1, \beta_2, \beta_3$ 三个系数显著大于 0，意味着上述三个机制是存在的。^③

① 也即 $\hat{r}_t^{(q)} = f [a_t^{(q)}]$ ， f 为 Lowess 拟合。

② 由于 $[r^* - r_t^{(q)}] \geq 0$ ，因此通过示性函数 $I_{[a_{t+1}^{(q)} \geq a_t^{(q)}]}$ 对其符号加以校正，否则模型将无法识别。

③ 若 $a^* \geq a_t^{(q)}$ 且 $\beta_1 > 0$ ，不考虑后面两大要素，则有 $a_{t+1}^{(q)} - a_t^{(q)} \geq 0$ ，进而有 $a_{t+1}^{(q)} \geq a_t^{(q)}$ ，最优偏向成立；若 $\beta_1 \leq 0$ ，则有 $a_{t+1}^{(q)} \leq a_t^{(q)}$ ，最优偏向不成立。若 $a^* \leq a_t^{(q)}$ 且 $\beta_1 > 0$ ，不考虑后面两大要素，则有 $a_{t+1}^{(q)} - a_t^{(q)} \leq 0$ ，进而有 $a_{t+1}^{(q)} \leq a_t^{(q)}$ ，最优偏向成立；若 $\beta_1 \leq 0$ ，则有 $a_{t+1}^{(q)} \geq a_t^{(q)}$ ，最优偏向不成立。

在宏观部分中，即图2下半部分，宏观行动指标可以由分位数代理的微观行为重塑。这些行为的变化受到结构因素与外生社会的影响，也即 $A_{i,t+1} - A_i = \sum_i \gamma_i (C_{i,t+1} - C_{i,t}) + \eta E_t$ 。其中， $C_{i,t}$ 表示 t 时间受到的结构性作用，这些作用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学科概念网络结构的变化作用，其二是新概念与新理论变动所构成的要素变化作用。 E_t 则是外生社会影响，这一影响并不以变动的方式影响宏观知识变迁。

其中，结构变化作用主要指概念网络环境是否有利于新概念、新理论的出现或理论体系的建立，研究分别使用概念可塑性、理论可塑性与内核规模三个指标，这些指标的计算如下所示。其中，概念可塑性借鉴了 Evans 等人的相关研究^①，理论可塑性则借用了网络分析中常用的传递性指标。这里通过作差来保证概念网络环境变化与学者的行动变化的方向一致。针对理论体系，我们采取内核规模作为其网络环境的测量。与微观差分模型相似，正的系数意味着结构因素与学者的宏观行动呈现同向的变动。

$$\text{概念可塑性}_{d,t} = 1 - \cos \langle F_{d,t}, F_{d,t-1} \rangle = 1 - \frac{F_{d,t}^T F_{d,t-1}}{\sqrt{\|F_{d,t}\| \|F_{d,t-1}\|}}$$

$$\text{理论可塑性}_{d,t} = 1 - \text{Transitivity}(G_{d,t}) = 1 - \frac{3 \times \text{形成三角形的三元组数}}{\text{所有三元组数}}$$

$$\text{内核规模}_{d,t} = \frac{n_{\text{core}}}{N}$$

要素变化作用则指沿着“概念—理论—理论体系”的递进性影响，其中前者的要素变化会影响后者的变动。为清晰起见，研究将模型所使用的所有变量、计算方法与直观解释列于表3。

表3 “微观—宏观”模型的变量及其解释

变量	计算方法	直观解释
微观模型		
行为变化	$a_{i,t+1}^{(q)} - a_i^{(q)}$	(因变量) 学者在两年间行为的变化
中心趋向作用	$a_i^{(0.5)} - a_i^{(q)}$	(自变量) 学者行动与学者行动分布中位数之间的差异
最优趋向作用	$a^* - a_i^{(q)}$	(自变量) 学者行动与获得最多奖励对应的学者行动之间的差异
回报差异驱动	$r^* - r_i^{(q)}$	(自变量) 学者获得的奖励与最高奖励之间的差异，这些奖励包括被引数与2024版知网综合影响因子两类，相互构成稳健性检验
宏观模型		
宏观行动变化	$A_{i,t+1} - A_i$	(因变量) 宏观学者行为比例在两年间的变化
概念可塑性变化	$C_{1,t+1} - C_{1,t}$	(自变量) 概念可塑性在两年间的变化，其中概念可塑性利用两年间概念相似程度辅助测量，可以理解为网络是否向“新概念”开放
理论可塑性变化	$C_{1,t+1} - C_{1,t}$	宏观模型(自变量) 理论可塑性在两年间的变化，其中理论可塑性利用传递性辅助测量，可以理解为网络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新理论
内核规模变化	$C_{1,t+1} - C_{1,t}$	宏观模型(自变量) 内核规模在两年间的变化，其中内核规模利用内核节点在所有节点中的占比测量，越高意味着学科理论内核越大
概念要素变动	$C_{2,t+1} - C_{2,t}$	(自变量) 学者引入新概念的行为比例在两年间的变化
理论要素变动	$C_{3,t+1} - C_{3,t}$	(自变量) 学者引入新理论的行为比例在两年间的变化
外生社会影响	E_t	(自变量) 该学科所有词汇在当年人民日报中的平均出现频率

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现状及其变迁过程

(一) 新概念引入行为在各个学科间的变化

图3展示了从1990年到2022年间学者使用新概念的比例，其中黑色实线为各学科新概念比例的均值，其他不同颜色虚线则为各个分支学科的情形，右侧的图例按学科均值排序。从整体上来看，新概念比例从1990年到2022年间逐渐减少，这意味着各学科使用的概念框架越来越确定，所使用的新概念越来越少。在2015年

① Eliza Evans, et al., “Measuring Paradigmaticness of Disciplines Using Text,” *Sociological Science*, 3, 2016.

以后，各个学科新概念比例的变动趋于稳定。总体来看，从 1990 年到 2022 年期间，学者使用新概念的比例呈现近似幂律的下降，并在 2015 年以后几乎接近于 0。

从分支领域来看，各个学科几乎都表现出了相似的下降趋势，只不过在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异。在 1995 年前后，各个学科的波动情况较为明显，进入 21 世纪后，几乎所有学科均呈现平稳下降趋势。相对而言，宗教学、考古学、哲学、社会学具有相对更高的新概念比例。对于已经较为成熟的经济学、文献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其本身引入新概念的比例就相对更低，但依然经历了一定的下降。上述结果支持假设 1a。各个学科从最初的发散状态，到 2022 年新概念几乎不再产生的集中化趋势，表明各个学科似乎都在从早期大量的概念创新，走向稳定的概念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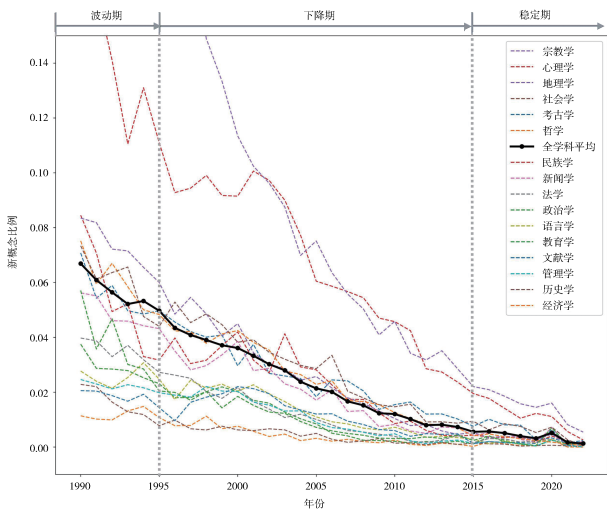


图 3 从 1990 年到 2022 年学者使用新概念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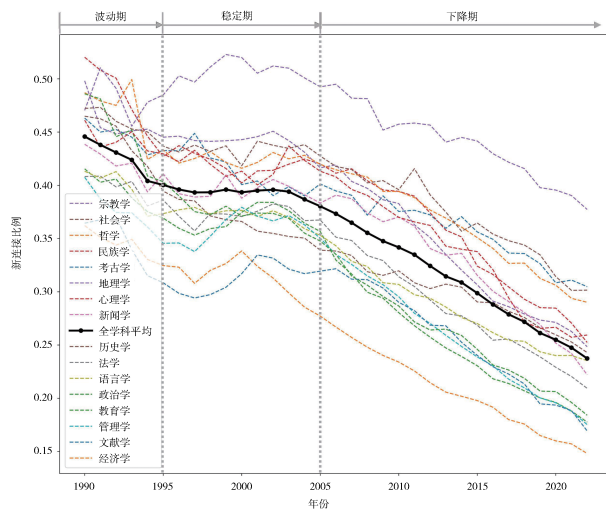


图 4 从 1990 年到 2022 年学者建立新连接的比例

(二) 新理论引入行为在各个学科间的变化

图 4 中所显示的 1990—2022 年间新理论的变化动态与新概念相似，均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但下降的模式则存在一定差异。其一，理论产出的下降明显分为三个阶段，1995 年以前建立新连接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在 1995 年到 2005 年之间则几乎持平，在 2005 年以后继续快速下降。其二，相较于概念要素最终走向统合，新理论的引入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学科差异。

然而，并不能简单认为新理论的下降意味着各个学科都不再创新。本文从概念网络的视角对新理论进行定义，但在不同概念之间建立新组合只是创新中的一种。Leahey 等人在研究中识别出了新发现、新方法、新结果三类创新，而本文所采用的定义类似于其中的“新发现”。^①事实上，新颖性是科学发表所具有的认识论规范之一^②，任何论文都具有其创新之处，而“新发现”的下降可能恰恰意味着论文转向使用新方法来开展已有的研究，或者在现有的概念组合中发现了不同以往的结论。这表明各个学科具备了自己所确定的持续关注“典型化事实”，而较少地去延展各个学科所具有边界，这同样是体系化的一种表征。

分支学科具有与整体趋势类似的效应，与新概念变化相似，依然是宗教学、考古学、社会学、哲学更多地选择在概念之间建立新的联系。不同的是，这一学科特性最终没有向高度体系化的学科（例如经济学）收束，而是在整个学术变迁过程中保持了对新理论的偏好，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学科能够依据经验现象与事实及时对研究兴趣进行重新定向。而经济学、文献学、教育学、管理学、政治学则为新理论引入行为占比的最后五位，这些学科显然具有成熟的学科领域，并持续关注特定的经验事实，从而较少出现新理论。总之，假设 1b 得到了支持，而各学科在走向各自理论体系化的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学科特性。

① Erin Leahey, et al., “What Types of Novelty are Most Disrup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8(3), 2023.

② 雷斯尼克：《真理的代价：金钱如何影响科学规范》，蔡仲、韦敏译，第 45—51 页。

（三）理论体系的形成

正如图 5、图 6 所示，从 1990 年到 2022 年，整体的学科内核规模不断上升，而学者同内核进行对话也更加频繁，这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日趋完备提供了直接证据。正如内核规模变化所展现的，在各个学科中一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内核逐渐出现，构成这个内核的概念受到了更多关注，而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各个学科的充分探索。在行为上，后续论文也需要同这些内核概念进行对话，从而符合学科发表的规范性要求，并更能得到同行评议人的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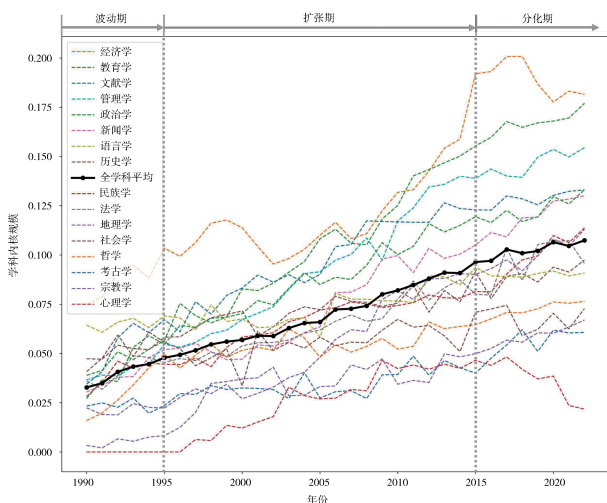


图 5 从 1990 年到 2022 年的学科内核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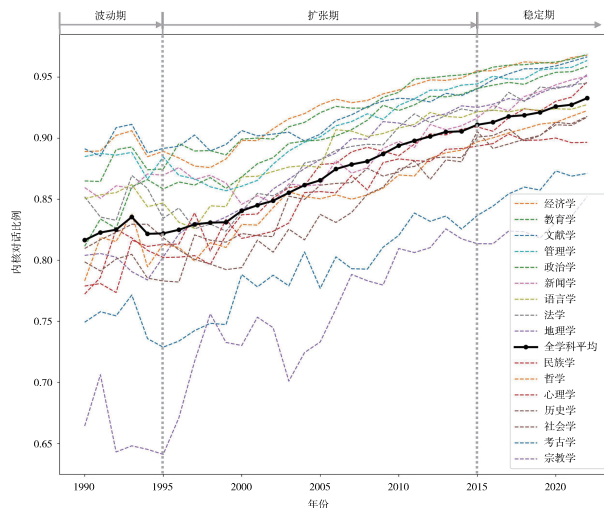


图 6 从 1990 年到 2022 年学者与内核进行对话的比例

具体来看，内核规模从 1990 年开始呈现线性的增长，但在 2015 年以后出现了波动放缓的趋势。不同学科内核规模的变动过程呈现出“差异化”的态势，这可能是导致内核规模在后期波动放缓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学科走向了更高的内核规模，部分学科则仅仅维持其现有规模甚至有所下降。其中，内核规模已经很高的经济学反而经历了一个十分迅速的增长过程，而内核规模原本很低的心理学、宗教学、考古学的体系化进展反而十分缓慢，甚至心理学的内核规模在 2015 年以后还有所下降。然而，无论内核规模如何变化，学者同内核的对话普遍升高并呈现收束，这表明即使理论体系的发展进程存在学科差异，这些学科也需要在与传统进行对话的框架下开展研究，这一对话比例最终可能固定在高度体系化学科（经济学、教育学、文献学、管理学）所稳定的 0.95 左右。上述结果支持假设 1c。

最后，各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化的程度与新概念、新理论相类似，相对更加体系化的经济学、教育学、文献学、管理学、政治学排在前列，而出于各种原因体系化程度相对更低的宗教学、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排在后面。

（四）相关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目前引入的新概念日趋减少、越来越少地在两个概念之间建立全新的连边以引出新的学科理论，各个学科整体上都在走向体系化，概念网络的内核愈发增大，与内核的对话也愈发增多。依据上述图像所呈现出的模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在 1995 年以前，新概念被更多地引入，新理论的生成尽管有所下降，但也维系在较高的水平，这表明 1995 年以前的学科处于剧烈的变化当中。我们认为这是由于社会转型与西方理论进入所带来的震荡状态。在这一阶段，各个学科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快速的社会变迁，涌现了大量新论述与西方的新思潮，导致理论体系不断波动。然而，这些新出现的概念相对来说较为零散，尽管学者在不同概念之间建立了大量联系，这些联系难以有机地结合，形成更加成熟的知识体系，因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的体系化水平较低，且存在一定的波动。

然而，1995—2005 年间的变化并不像硬核革命所设想的那样，新理论迅速减少，并快速生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相反，在这十年间，尽管新概念进一步减少，新理论却维持不变，这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进入

了一个理论重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学术不断消化吸收既有理论并逐步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从而新连接占比保持稳定，但引入的概念减少，内核扩大，体系化水平提高。相应地，各个学科逐渐确立了学科分野，并初步形成了自身的核心理论。这也是本文将知识体系构建过程归纳为“软革命”的核心原因：知识体系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快速取代，而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整合”阶段，并从中逐步明确自身的知识体系。

最终，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进程，各个学科结合自身的学科定位与社会责任，以及十年间积累的代表中国实践的经验材料，重新确立了自身的典型化事实并保持持续的观测与跟进。在 2015 年后，各个学科陆续形成了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新概念、新理论的引入逐渐减少，并在 2016—2018 年实现了整个学科概念网络内核规模的稳定化。

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变迁机制

(一) 微观机制

本节通过构建“宏观—微观”分层差分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变迁的微观机制。其中，表 4 展现了微观模型的结果，模型以学者的行为变化为因变量，考察中心趋向作用、最优趋向作用与回报差异驱动作用三个机制的影响，分别对应前述模型的 β_1 、 β_2 与 β_3 。模型选取了两类奖励的测量方式：引用与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两者互为稳健性检验。模型中所有变量已标准化，以确保系数之间的可比性。

首先，中心趋向作用在新理论与理论体系两个模型中稳定为正，这意味着学者存在“从众效应”，会朝向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策略转变。类似地，最优趋向作用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学者的研究策略逐渐朝着每年受到最多引用、发表在最好期刊上学者的研究策略看齐。这两者共同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策略会变得越来越集中化，大多数学者的策略与学术界所奖励的最优策略会愈发重合。最后，回报差异驱动在六个模型中同样显著为正，说明学者目前采取策略获得的奖励与当红文章获得的奖励差异越大，他学习当红文章的研究策略的动力就越强，以期在后续发表中获得更多引用，或发表在更加权威的期刊上。结合表 4 来看，假设 2a、2b 与 2c 均得到证据支持。

表 4 微观模型结果

	新概念		新理论		理论体系	
	模型 1.1 (引用)	模型 1.2 (影响因子)	模型 2.1 (引用)	模型 2.2 (影响因子)	模型 3.1 (引用)	模型 3.2 (影响因子)
中心趋向作用	0.229*** (0.005)	-0.012** (0.004)	0.067*** (0.005)	0.017** (0.005)	0.022*** (0.006)	0.062*** (0.005)
最优趋向作用	0.107*** (0.004)	0.306*** (0.004)	0.350*** (0.004)	0.351*** (0.004)	0.354*** (0.004)	0.303*** (0.004)
回报差异驱动	0.019*** (0.005)	0.200*** (0.004)	0.103*** (0.005)	0.040*** (0.005)	0.022*** (0.006)	0.112*** (0.005)
样本量	51200 ^①	51200	51200	51200	51200	51200
R^2	0.071	0.151	0.151	0.128	0.130	0.109

通过对比各个模型中微观效应的差异可以发现，几乎在所有情形下，最优趋向都是最强的解释指标，这表明学者首先参照最优的做法，即以高引用或发表在权威期刊的论文为参照，确定自己是否在研究中引入新概念、新理论，或者是同现有理论内核进行对话。结合前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整体进程，各个学科的高质量论文都已不再引入新的概念、更少地将概念进行创新性的组合，因此其他学者也竞相效仿。此外，越贴近学科内核的论文受到的奖励越多，尽管其间可能存在反向的因果效应，这也足以表明与现行的学科内核对话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过于新颖的论文反而由于无法同学科内核对话而被忽略。^②

① 此处样本量系 16 个学科，横跨 32 年的分析，共计 512 个“学科—年”观测，这也是下文宏观模型的样本量来源。在微观模型中，由于选取了 100 个分位数代理，样本量为 51200。

② Aaron Gerow, et al., “Measuring Discursive Influence across Scholarship,”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13), 2018.

（二）宏观因素

表5展现了宏观模型中各个系数的拟合值，这些系数表明了结构变动、要素变动与外生社会因素对知识体系变迁的影响。该模型以宏观行为变化作为因变量，通过学科概念网络结构的变化（按照不同的行为类型选取不同的测度指标）、概念与理论的要素变动以及外生社会因素加以解释。模型中所有变量已标准化，以确保系数之间的可比性。

结构变化作用测量了学科概念网络结构对行为变动的影响。这些系数全部为正，表明学科概念网络结构与学者研究策略存在某种一致性。考虑到二者并非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这种一致性进一步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深层次的互动与相互影响，从而使得概念网络结构的演变路径与学者研究策略的变化模式高度契合。以新概念的介绍为例，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学者通常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引入一个全新的概念；其二是沿用既有概念。^①然而，学者所处的“概念网络”主要因其阅读的文献所建构，这一隐性语境往往对新概念的产生构成抑制作用。原因在于，学术共同体普遍倾向于使用既有的成熟概念，这导致外部观测到的“概念可塑性”较低。在此背景下，学者为了提升论文被引用的可能性、增加在权威期刊发表的机会，往往更倾向于沿用既有概念，以增强研究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契合度，进而获得学科共同体的认同。而当多数学者都采取这一策略时，概念创新的可能性将进一步降低，概念网络的可塑性随之下降。结果，后续学者在进行知识建构时便更易受限于这一日益稳固的概念框架，进而形成“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的演化特征。新理论与理论体系的变动也适用于上述分析。综上所述，假设3a得到了证据支持。

表5 宏观模型结果^②

	模型4 (新概念)	模型5 (新理论)	模型6 (理论体系)
结构变化作用			
概念可塑性变化	0.301 *** (0.042)		
理论可塑性变化		0.231 *** (0.060)	
内核规模变化			0.442 *** (0.039)
要素变化作用			
概念要素变动		-0.022 (0.044)	-0.176 *** (0.039)
理论要素变动			0.118 ** (0.039)
外生社会影响			
外生社会因素	0.161 *** (0.042)	-0.006 (0.060)	0.058 (0.040)
样本量	512	512	512
R ²	0.115	0.056	0.253

在结构变化作用之外，概念引入、理论引入与体系对话三个要素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也即“要素变化作用”。模型5显示，新概念引入的变动无法解释新理论的变动，这表明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假设3b。结合图3与图4所示轨迹，尽管新概念与新理论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其变动路径差异明显，这进一步削弱了在概念与理论之间建立直接联结的合理性。

模型6显示：新概念出现比例的下降显著对应于学科理论体系化程度的上升；同时，新连接比例的变动也与理论体系的变化呈正向关联。这些发现为假设3c提供了证据，并符合直觉逻辑：新概念比例的下降与新理论的增加均促使概念网络趋于密集化，而密集化的概念网络更容易识别出较为稳定的学科内核，进而促进与该内核的对话并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从知识体系实际变迁的趋势来看，新概念与新理论的比例均呈下降态势，新概念比例的下降有助于知识体系的形成，但新理论的减少按逻辑应导致体系的去结构化或松散化，不过新概念比例的下降对体系形成的正向作用要大于新理论比例下降所带来的负向作用（0.176 > 0.118），故

① 郭忠华：《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② 在表4所展现的模型结果中，结构变化作用测量的是三个指标（新概念、新理论、理论体系）的环境因素，这些环境因素会对指标变动产生结构性影响；另一方面，新概念、新理论、理论体系的递进关系导致了前面的要素可能成为后面要素的结构限制。例如新概念的减少会内生地减少新理论的形成，这构成了模型的第二部分，也即要素变化作用。

而理论体系整体上依然是趋于结构化的。

针对外生社会因素的作用，模型 4 表明：受到外生社会因素介入的学科更容易产生新概念。然而，新理论的生成以及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外生社会因素之间并未呈现出显著相关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外生社会因素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演变过程中仅扮演了次要角色？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区分知识体系“变迁的过程”与“知识体系内容”这两个不同的要素，因为二者所受到的影响机制并不完全相同。

为了进一步测量外生社会因素对知识体系“内容”的影响，研究统计了各学科内核概念在《人民日报》中的平均出现频率，并计算其与该学科所有概念平均出现频率的比值。表 6 展示了这一比值的统计结果。结果表明，各学科的内核概念在《人民日报》中的出现频率显著高于其他概念，这一发现表明：外生社会因素在塑造学科理论体系的“内容焦点”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换言之，相较于对知识体系变迁路径的影响，外生社会因素在引导学科注意力聚焦与理论体系内容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

表 6 外生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学科的体系化进程的平均秩

学科	体系化进程的平均秩	平均出现频率之比	学科	体系化进程的平均秩	平均出现频率之比
心理学	4.67	16.45	民族学	6.00	8.95
宗教学	1.00	14.17	历史学	9.33	8.83
考古学	4.00	13.32	语言学	9.67	8.70
社会学	3.00	11.66	政治学	10.33	7.62
哲学	5.00	11.27	文献学	13.33	7.45
地理学	5.67	10.36	教育学	12.67	7.40
新闻学	9.00	9.10	管理学	13.67	7.32
法学	9.33	9.08	经济学	16.00	5.45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表 6 中的排序结果与图 3、4、5、6 中所呈现的学科排名高度相关（表中亦记录了各学科在上述图表中的平均秩次），这进一步印证了尽管各学科普遍受到外生社会因素的影响，但在体系建构路径上仍保留了各自的学科特性。具体而言，经济学、文献学、管理学等研究对象相对稳定、方法高度定量化、共识程度较高的学科，在表 6 中排名靠后；而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则排名居前。这种差异表明：虽然外生社会因素对各学科均构成重要影响，但学科内部差异使得外生社会因素在各学科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差异性，从而构成了一种“科学—反思”的学科分工模式，这一点也与不同学科内核规模的差异化呈现相一致。

更进一步地说，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并非意味着将知识简单地固化于确定的概念、命题，或对这些命题的持续观测与更新。系统性的自我反思能力本身亦是知识体系成熟的重要表征之一。本文在这一维度上的测量存在明显不足，未来有待更多学者在知识体系研究中对此展开深入探索。

六、总结与反思

从 1990—2022 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呈现三方面的变化：首先，学者逐渐减少在现有概念网络的基础上发明新的概念；其次，各个学科的理论也逐渐饱和，学者更少在概念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最后，一个愈发庞大且逐渐稳定的学科内核正在出现，新的论文愈发需要同学科内核产生对话。这一体系化进程的开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内生结构因素、外生社会因素与行为因素。其中，学科概念网络内部结构因素的影响虽然符合逻辑，但是无法解释新理论出现减少与理论体系形成这两个经验现象的同时出现。外生社会因素则更多影响知识体系的内容而非形式。而微观的学者行为机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经验结果上，都是知识体系形成的主要机制。一方面，为了追求更高的引用或发表于更好的期刊，学者会对成功学者的行为加以效仿；另一方面，为了符合学界共同的认识论规范，学者也会对大多数学者的行为进行模仿。这两大行为（其中效仿行为的效果更加明显）导致了学术界整体新概念与新理论的减少以及内核对话的增加，并进一步推动学科知识不断朝向一个体系化的过程发展。

基于本文的经验现象，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体系构建需要经历“软革命”这一过程，也即在本

国社会变迁与西方理论涌入的情形下，逐渐确定自身的学术概念与核心理论，形成自主的研究议程与核心结论。^① 在“软革命”阶段结束后，各个学科所使用的专业概念、公认的核心理论逐渐凝聚，进而形成一个确定的理论体系。

本文的结果显示，在中国知识体系变迁过程中，一个体系化内核正在不断形成并逐渐稳定，这为未来进一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一，随着新概念的减少，学术概念的生产应该从数量为主转为质量为主，重点形成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概念。其二，虽然新概念供给的减少将对创新理论产生结构性影响，但不代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将会停滞。就科学性来说，实证研究的精细化推进与关键领域的新发现，能够持续推动学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突破性认知；就反思性来说，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概念的出现，将为理论创新提供新的概念基础，通过对标识性概念网络的系统构建与深度阐释，将有助于实现知识生产的范式突破。

囿于篇幅与材料限制，本文仍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主要以知识变迁的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对知识体系变迁的实质性内容考察不足。各个学科的“软革命”究竟是如何重组自身知识体系的？有待进一步探索。其次，本文所使用的变迁模型略有简化，例如知识遗忘的情况就没有考虑。尽管哲学社会科学从整体上呈现知识积累的态势，知识遗忘依然是子领域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其对整体知识变迁的作用及其微观基础依然有待澄清。^② 最后，本文聚焦于1990年到2022年，从而无法验证现有过程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下是否会产生“代际循环”的形式，这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

（责任编辑：朱颖）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System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990—2022)

ZHU Bin, WEI Tianle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and its expanded edition from 1990 to 2022, this study examines trends and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knowledge system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new concepts, new theories, and theoretical system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concepts and theor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gradually declined. A progressively expanding conceptual core emerged within the disciplinary conceptual network,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holars engaging in dialogue with this core. This process signifies a transition from a “soft revolution” phase of borrowing Western concepts and theories to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core concepts, core conclusions, and stylized facts with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ultimately forming a stable knowledge system. These macro-level shifts can be explained through endogenous structural factors, exogenous societal influences, and individual behavioral factors. Among these, individual behavior demonstrates the most significant explanatory power: scholars' emulation of successful peers and mimicry of majority scholarly actions effectively account for the overall trend of systematization.

Key words: knowledge system evolution, conceptual network, mechanistic explanation

^① 冯仕政：《范式革命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社会》2022年第6期。

^② 李钧鹏、周港：《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与遗忘（1980—2022）》，《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1期。